

揭秘

由于身处隐蔽战线,李云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知。李克农曾对她说:“你是无名的英雄。”

除了耳朵不大好,老人身体健硕,思路清晰。她是目前上海唯一健在的中央特科成员。今年,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整整80年。老人淡然地说:“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虚度,为祖国尽了小小的力量。”

宋庆龄的联络员

无名英雄中央特科李云

“当年,是党派我担任宋庆龄的联络员的。”忆起初见宋庆龄的情景,李云笑了:“1936年5月下旬的一天,在莫利哀路(今香山路)29号宋庆龄的寓所,宋庆龄身穿黑色旗袍、黑色高跟鞋,笑着端详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我:‘啊呀!是位小姑娘呀!’”

“飞行集会”撒传单

民国初期的上海,民生多艰。“家中祖辈都念书,父亲写得一手好字,还是只能去衣服店做伙计。那时穷人要改变命运真难!”有些激动的李云对童年时的苦难仍很清晰。

虽然穷,父亲坚持送李云去了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第一小学。正是在这所小学,革命的种子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。“学校中的老师基本都是共产党员。”1929年,小学六年级的她成为了共青团团员。临近毕业,李云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抗争:“1930年,学校师生参加反对清廷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日活动,骆京轩校长被捕,学校党小组的老师带领着学生,跑到街上散发‘反对捕房摧残教育’等内容的传单。”

小学毕业后的李云在闸北丝厂总工会做青工工作,人小又机灵,“当时让我送信送书,里面其实是党内资料。”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“飞行集会”:当时传单就绑在自己腰上,到地点给隐藏在人群中的同志,而后四处散发传单,大家高叫“打倒帝国主义!共产党万岁!”一撒完传单大家就如鸟兽散。

进入中央特科

1930年10月,参加了丝厂总工会“党员学习班”的李云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。“那时的想法很简单,家里很贫困,穷人要翻身,跟着共产党走,反对帝国主义。最难忘的是上海总工会领导当时找我们谈话,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,说了三点,一是严守党的秘密,二是坚定自己的立场,三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。”

这三点从此贯穿了李云的生命。后来1932年进入中央特科的这段经历,被李云深深埋藏在心中。“入党80年了,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组织纪律严格。我在中国福利会工作了将近30年,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年是组织上派我去宋庆龄身边工作的。李

克农曾经说过,‘你们是无名英雄。’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。”

潜伏敌营传情报

“我们在特科是属于陈云领导的,当时组织派我去河南,工作对象叫惠东升,是国民党八十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的营长。我们通过他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。”“当时陈云派我们打进内部去,徐强(后来成为李云的丈夫)的身份是惠东升老婆的表哥,我是惠东升的侄女。”

1932年,当时在中共上海浦东区委担任青年工作的李云,被组织派到河南,由徐强直接领导。

“惠东升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,人很耿直,当时很不满意国民党的腐化。有次他来上海,和一个朋友冯三昧说起过自己的想法。通过同情革命的冯三昧介绍,徐强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,可以做他的工作,把他的部队拉出来,投奔革命。后来,惠东升同意我们派人过去。”

“通过惠东升获取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后,徐强喜出望外,急忙交给我。我的任务是密写情报,连夜用药水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书背后,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和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,放在一条棉被絮里,交给一位同样潜伏在河南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文书的老傅同志,急送到了上海的党组织手中。”李云说得很平静。

然而,李云和徐强后来的被迫转移则惊心动魄:“那年8月,惠东升被调到潢川,徐强觉得很奇怪,提醒惠东升小心。第二天上午,惠东升便被叫到司令部,一直没有音讯,徐强让惠东升的妻子打电话询问,惠东升说,我在这里蛮好,一定不要让‘表哥’走了。徐强一听,知道坏了,惠东升一定被扣留了,必须转移!他发现原定到潢川北部的商城路线已经暴露,临时决定花十块钱请个农民带路,沿着潢川城外直奔光山司令部,再到信阳,坐火车经陇海线由宿县到上海。”

“原来,有人叛变,向国民党



宋庆龄和李云



李云

告密,学兵营中的中共地方组织全部被破坏,牵连到惠东升,认为他勾结共产党,那天光山司令部派了马队追赶我们,幸亏临时换路。”李云说。

寻找毛岸英、毛岸青

1935年秋,我奉命在上海寻找毛泽东失踪的儿子。当时形势相当严峻,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,“特科”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,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,总负责人是邱吉夫,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,也是我的直接领导。一天,徐强突然

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,大的约十三四岁,小的约十一二岁。关于孩子的身份,他只说是烈士的儿子,从收养的人家跑掉了,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、毛岸青。

当年我掌管着“特科”唯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,从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,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了的电报。那时“特科”可能还有人也被派出找孩子,因为徐强给我圈了范围,就管老西门一带。

那时做情报工作的,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,不问也不能问。我只能到流浪儿多的地方找找看。像八仙桥小菜场(今淮海路西藏路一带)附近有家专门给人送饭的“包饭作”,常拿剩饭剩菜施舍乞丐,一到中午流浪儿便蜂拥而至抢饭吃;还有铁马路桥堍,聚集着众多帮黄包车夫推车上桥挣铜板的流浪儿……到底找过多少地方,记不清了,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,不敢随便打听,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,一站就是半天。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,没找着。我曾怀疑孩子是不是被敌人绑走了,但徐强说,已通过内线查遍上海的警察局和巡捕房,确认孩子没被抓走,应该还在流浪。

1936年夏天前后,徐强告诉我,孩子找到了,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,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。

担任宋庆龄联络员

“周恩来总理关照,‘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,她要你办什么事,你一定要给她办好。’我一直将这句话谨记。”

“当年,是党派我担任宋庆龄的联络员的。”忆起初见宋庆龄的情景,李云笑了:“1936年5月下旬的一天,在莫利哀路(今香山路)29号宋庆龄的寓所,宋庆龄身穿黑色旗袍、黑色高跟鞋,笑着端详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我:‘啊呀!是位小姑娘呀!’”

1936年4月,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,加强统一战线工作,并恢复同坚持在上海斗争的中

央特科的联系。一次,冯雪峰和宋庆龄研究有关救国会工作时,宋庆龄提出希望党派一位共产党员给她,能经常与她联系。党组织最后选定了有7年革命经历的李云。“开始时,每周去2-3次,后来因为需要,宋庆龄要求我每天去。每次从宋庆龄家回机关驻地,我必须花费几个小时兜马路,直到确保身后没有‘尾巴’为止。”李云说。

我党通过李云和宋庆龄保持着密切联系。1937年7月17日庐山会谈后,周恩来等来到上海,要求见宋庆龄,请李云约定时间。“当我告诉宋庆龄这个消息后,她十分高兴。会面时,周恩来将庐山会谈情况向宋庆龄作了介绍,当提到蒋介石对抗日仍很动摇,以致会谈没有结果时,宋庆龄很生气:‘怎么能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,岂不是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了吗?’宋庆龄一生爱国爱民,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友,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能代表党组织与她联络,是我的荣幸。”李云说。

初创少年宫

解放后,应宋庆龄之邀,李云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。1952年12月,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后的宋庆龄,对当时苏联的少先宫特别感兴趣。回上海后,她把李云叫到家中:“中国孩子也应该有一个如苏联少先宫那样的校外活动场地,咱们就叫少年宫,先解决房子与园地的。”“原来孙科的房子很大,花园也大,结果我调查下来,孙科的住宅已经成为制药厂,因此作罢。有人提出将少年宫建在静安公园里,宋庆龄不同意,她认为公园是群众活动场所,少年宫怎能侵占?”李云说,“最后找到了英国犹太人埃里·嘉道理的私人住宅,房子一直空着,宋庆龄很高兴,要我们将它租下。不久上海房地局将其作为代管,租给了中福会少年宫。于是,1953年6月1日上海有了中国第一座少年宫。‘少年宫’三个字是毛主席题写的。”

据《解放日报》